

《三国志》引诗探析

房锐, 谢俊培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成都 610066)

摘要: 陈寿深受经学的影响, 其《三国志》继承了先秦两汉史书以教化、讽谏为目的的引诗传统。由于受“切世大事”的史事著录原则的影响, 《三国志》取材精审, 行文简净, 较之前的史传作品, 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研究《三国志》引诗的特点及其成因, 是研究古代史书引诗传统、引诗演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关键词: 陈寿; 《三国志》; 引诗

中图分类号: K20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17)01-0115-04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17.01.015

陈寿《三国志》是继班固《汉书》之后又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主要记载了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 共65卷。其中, 《魏书》30卷, 《蜀书》15卷, 《吴书》20卷。《三国志》以“文质辨洽”^{[1]285}著称, 取材精审, 笔法简洁, 叙事井然, 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 陈寿在《三国志》中收录了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一些与诗学相关的文献, 这些文献对于认识魏晋时期的经学传播、诗教传统、史家引诗传统及诗学发展等具有相当的价值。在此, 笔者拟对《三国志》引诗的特点及其成因进行探讨。

《三国志》引诗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

(一)《三国志》征引《诗经》的概况及特点

先秦两汉史书历来有引用《诗经》的传统, 《三国志》也不例外。《三国志》引用《诗经》, 按其所引内容的形式, 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引完整诗句。如卷二二《魏书·陈群传》: “《诗》称‘仪刑文王, 万邦作孚’; 又曰‘刑于寡妻, 至于

兄弟, 以御于家邦’。……”^{[2]635}引用了《诗经·大雅》之《文王》、《思齐》中的完整诗句。

二是引具体篇名或引某篇中的关键词指代篇义。引具体篇名, 如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感《四牡》之遗典, 思饮至之旧章”^{[2]1432}两句, 《四牡》乃《诗经·小雅》中的篇名。引某篇中的关键词指代篇义, 全书仅有两处, 均在卷十九《魏书·陈思王植传》所录曹植《求自试表》中。文云: “植常自愤怨, 抱利器而无所施, 上疏求自试曰: ……故君无虚授, 臣无虚受; 虚受谓之谬举, 虚受谓之尸禄, 《诗》之‘素餐’所由作也。……今臣无德可述, 无功可纪, 若此终年无益国朝, 将挂风人‘彼其’之讥。是以上惭玄冕, 俯愧朱绂。”^{[2]565-566}曹植引用《诗经·魏风·伐檀》“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3]358}中的关键词“素餐”, 指代该篇的意义, 并以此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接着, 又引用《曹风·候人》“彼其之子”^{[3]384}中的“彼其”一词, 指代无功受禄的篇义。

三是引《诗经》书名或《风》、《雅》、《颂》类题。卷十二《魏书·崔琰传》中, 崔琰的谏书中有“殷鉴夏后, 《诗》称不远”句^{[2]368}, 《诗》指《诗经》。据统计, 《三国

收稿日期: 2016-10-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诗学文献集成校笺”(14ZDB06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房锐(1966—), 女, 河南沈丘人,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及巴蜀文化研究;

谢俊培(1991—), 女, 四川内江人,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志》提及《诗经》书名共 16 处。如卷十四《魏书·程晓传》所录程晓的上疏中就有“曹恭公远君子，近小人，《国风》托以为刺”^{[2]431}等句；而《三国志》中提及《风》、《雅》、《颂》类题共 6 处，分别为《风》3 处，《雅》2 处，《颂》1 处。由于此类仅作为了解《三国志》引诗特点的参证，因此，其数量未被统计入《三国志》引《诗经》总数之中。

据笔者统计，《三国志》引《诗经》中的完整诗句共 31 处，涉及诗篇 22 首。引《诗经》具体篇名 16 处，涉及 14 篇。在《风》、《雅》、《颂》三类中，征《雅》比例最大，其次为《风》，再次为《颂》。

《三国志》引《诗经》，按其引用者不同，可分为两类。一是作者直接引用《诗经》，包括文末评 4 处和作者行文中的叙述 1 处。二是史书中的人物在奏疏、诏令、对话、书信中引用《诗经》。其中，奏疏中引用《诗经》的数量最多，共 18 处，诏令中引《诗经》8 处，对话中引《诗经》15 处。

按《三国志》引《诗经》形式的不同，又可分为言语引《诗》和著述引《诗》两种。言语引《诗》，“是指人们在言谈话语中对《诗》的引用，即通过在辞令中引用诗句以断事说理，把诗作为称引的论据，证明自己观点的合理性，以增强辞令的说服力和可信度”^{[4]3}。《三国志》人物对话中引《诗》，即属于言语引诗。著述引《诗》，“即引诗者在著书立说时根据需要引《诗》为用，以增强所述所论之说服力，此时的《诗》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经典，引诗者更多的是考虑诗句的意义以及所引之诗是否可以恰当地作为论说的依据”^{[4]4}。该类在《三国志》中运用较多，文末评、作者行文、奏疏、诏令、书信中引用《诗经》，均属于著述引《诗》。《三国志》中的言语引《诗》和著述引《诗》，虽然在引诗形式上有所不同，但二者在引《诗》目的上大多相同，即引《诗》以为据，引《诗》以证事。

在《三国志》中，著述引《诗》以为据的例子较多。如卷三《魏书·明帝纪》载：

六年春二月，诏曰：“古之帝王，封建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诗不云乎，‘怀德维宁，宗子维城’。秦、汉继周，或强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创业，诸王开国，随时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为后法也。其改封诸侯王，皆以郡为国。”^{[2]98-99}

这是诏书中引《诗》以为据的例证。“怀德维宁，宗子维城”两句，出自《大雅·板》^{[3]550}。诏书以此为据，证明分封同姓诸侯有利于捍卫王室。

又，卷二五《魏书·辛毗传》载：“帝方修殿舍，百姓

劳役，毗上疏曰：‘窃闻诸葛亮讲武治兵，而孙权市马辽东，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备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宫室大兴，加连年谷麦不收。诗云：‘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唯陛下为社稷计。’”^{[2]698}“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3]548}四句，出自《大雅·民劳》。郑玄笺云：“今周民罢劳矣，王几可以小安之乎？爱京师之人以安天下，京师者，诸夏之根本。”^{[3]548}辛毗以《民劳》为证，劝谏魏明帝不应过分劳役百姓，广修宫室，应为国家社稷考虑。这是谏疏中引《诗》以为据的例证。

《魏书·高堂隆传》载：“陵霄阙始构，有鹊巢其上，帝以问隆。对曰：‘《诗》云“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今兴宫室，起陵霄阙，而鹊巢之，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宫室未成，将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无亲，惟与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虑。……’”^{[2]710}“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两句，出自《召南·鹊巢》。高堂隆以此为证，警示明帝应深防远虑，防止他姓争位夺权。这是对话中引《诗》以证事的例证。

通过以上例证，可知《三国志》在诏令、谏疏、对话中引诗，均展现出引《诗》以为据、引《诗》以证事的特点，此类引《诗》，在《三国志》中比比皆是。

史传引《诗》，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左传》、《国语》、《战国策》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引《诗》、赋《诗》的社会风气，《史记》、《汉书》更是以《诗》证史，《诗经》成为其史料来源之一。相较前代史书引《诗》的特点，《三国志》引《诗》更为精简，多取诗歌本义，其引《诗》以证事的动机比较单一。

(二)《三国志》对私人诗作及歌谣的征引

《三国志》征引的私人诗作数量较少。卷十四《魏书·蒋济传》载：“文帝即王位，转为相国长史。及践阼，出为东中郎将。济请留，诏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宁，要须良臣以镇边境。如无其事，乃还鸣玉，未为后也。’”^{[2]451}魏文帝即位，任命蒋济东中郎将，蒋济请求留任京都，魏文帝在诏书中引用刘邦《大风歌》，敦促蒋济外出任职，守卫边境。卷十九《魏书·陈思王植传》载，曹植在《陈审举表》中，引用宋玉《九辩》“国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2]573}两句，欲以此劝谏魏文帝应在王室贵族、诸侯王中选拔辅佐朝政的人才，而不要舍近求远。以上两例属于书中人物对诗歌的引用。黄初四年(223)，曹植应诏回京，未被曹丕召见，因而作诗二首陈情，希望能够面见曹丕。《魏书·陈思王植传》收录了这两首诗作。据卷五三

《吴书·薛莹传》记载,建衡三年(271),孙皓“追叹莹父综遗文,且命莹继作,莹献诗曰……”^{[2]1254}。由于记载史事的需要,陈寿在《三国志》中收录了曹植及薛莹的诗作。

《三国志》中收录了四首歌谣,这些歌谣短小精悍,且均出自《吴书》。其中,“曲有误,周郎顾”两句,称赞周瑜精通音律。卷五四《吴书·周瑜传》云:“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2]1265}

除此之外,其余三首均为谏言。“黄金车,班兰耳,闾昌门,出天子”四句,出自卷四七《吴书·吴主孙权传》,文云:“黄龙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劝权正尊号。夏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丙申,南郊即皇帝位。是日大赦,改年。……初,兴平中,吴中童谣曰:‘黄金车,班兰耳,闾昌门,出天子。’”^{[2]1134}《三国志》录此歌谣,以昭显孙权称帝乃天命使然。“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等句,是陆凯在劝谏孙皓不要迁都武昌的奏疏中引用的童谣。卷六一《吴书·陆凯传》载:

皓徙都武昌,扬土百姓泝流供给,以为患苦,又政事多谬,黎元穷匮。凯上疏曰:“……又武昌土地,实危险而瘠确,非王都安国养民之处,船泊则沉漂,陵居则峻危,且童谣言:‘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臣闻翼星为变,荧惑作妖,童谣之言,生于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2]1400-1401}

陆凯在奏疏中引用“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等句,并试图以“童谣之言”乃是天意使然的说法,劝说孙皓不要迁都武昌。

“诸葛恪,芦苇单衣箠钩落,于何相求成子閻”三句,出自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文云:“先是,童谣曰:‘诸葛恪,芦苇单衣箠钩落,于何相求成子閻。’成子閻者,反语石子冈也。建业南有长陵,名曰石子冈,葬者依焉。钩落者,校饰革带,世谓之钩络带。恪果以苇席裹其身而箠束其腰,投之于此冈。”^{[2]1441}此歌谣实为谏言,在诸葛恪生前便流传于世,而诸葛恪之死竟与其预言吻合^①。由此可见,《三国志》收录这些歌谣是出于史事叙述的需要,而非有意收录。与所录私人诗作不同的是,《三国志》所录歌谣多为谏言,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

《三国志》引诗具有上述特征,其原因是多种多样

的。

其一,深受“诗教”传统及史书引诗传统的影响。

“诗教”一词,出自《礼记·经解》,文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5]1609}《论语·泰伯》云:“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6]2487}可见,早在春秋时期,孔子等人已经大力推崇诗教。除了诗歌的教化作用外,孔子还提出诗具有兴观群怨的社会作用。《论语·阳货》云:“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6]2525}对此,孔安国、郑玄、朱熹等人多有阐释,此不赘述。可以说,从《诗经》采诗、献诗到编定,其“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7]1708}的目的不断得到强化推广,尤其是孔子对《诗经》政教作用加以论述后,《诗经》被纳入礼的范畴,最终成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3]270}的政教工具。

春秋战国时期,《诗经》在政治、文化、生活等方面被广泛的征引,史书在记载史实和行文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引用《诗经》。在《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史书中引用《诗经》已十分常见。《史记》、《汉书》及晚于《三国志》的《后汉书》延续了引《诗》的传统。据范亚栋统计,《史记》引用《诗经》的诗句共31次,涉及诗篇25首;《汉书》引用《诗经》的诗句共172次,涉及诗篇85首;《后汉书》中引用《诗经》的诗句共97次,涉及诗篇61首;《三国志》引用诗经的诗句共25次,涉及诗篇20首^{[8]6,7}。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也必然受到诗教传统和史书引诗传统的影响,引《诗》以为据,引《诗》以证事。可以说,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虽然经学独尊的地位已有所动摇,但在社会政治生活等方面,经学仍然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诗经》的政教功能、讽谏作用依然发挥着较强的作用,诗教传统、引诗传统在《三国志》中也得以延续。

其二,陈寿“切世大事”的史事著录原则。

陈寿著录《三国志》,采用的是“切世大事”的史事著录原则^[9]。他在《魏书·杜恕传》中提出:“恕奏议论驳皆可观,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2]507}在《晋书·陈寿传》中,范颙上表言:“臣等按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2]138}明乎得失、有益风化当是《三国志》的社会价值取向。陈寿在引诗时,引用更具政教作用的《风》、《雅》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陈寿“切世大事”的史事著录原则还体现在《三国志》对私人诗作和歌谣的收录上。《三国志》收录的私人诗作和歌谣较少,相对而言,对关乎军国大业等

方面的令文、奏疏却大量收录。如在《魏书·陈思王植传》中,陈寿不吝笔墨,收录了曹植《献诗》、《求自试表》、《求通亲表》、《陈审举表》等长篇诗文。收录这些诗文是因史事需要,非有意收录,均体现了陈寿对切世大事的史事著录原则。

其三,文质辨洽与行文简净的笔法。

《三国志》较少引用或收录私人诗作和歌谣,引用《诗经》也大多是史传中的人物引用,对诗义亦不多加阐释,这与陈寿行文简净的笔法有关。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称:“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迂固,非妄誉也。”^{[1]285}《晋书·陈寿传》说陈寿《三国志》“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10]2138}。“文质辨洽”体现了陈寿刻意求实,务使形式与内容、文采与史实均匀配合的著录笔法,不尚奇爱博,不以文害质,形成了《三国志》严谨质朴的文风。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称《三国志》“实高简有法”^{[11]181}。陈寅恪称“陈承祚著《三国志》,下笔严谨”^{[12]176}。《三国志》行文简净,首先体现在行文少有修饰渲染的语言,即使是文末的“评”,基本上只简要论述人物的功过得失、立传缘由等,篇幅不过200余字,点到为止,不同于《史记》、《汉书》洋洋洒洒,逞显才华。其次,《三国志》为文人立传仍以记述历史为主,不录文

人作品,不同于《史记》、《汉书》在文人传记中大量收录作品的做法。

清人李慈铭评价陈寿《三国志》:“承祚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作《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暗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为胜矣。”^{[13]917}李慈铭认为《三国志》虽体例严谨,简洁质朴,但却缺乏文采,暗淡无光。据《华阳国志》记载,陈寿“聪警敏识,属文富艳”^{[14]480},这与《三国志》简洁质朴的文风相矛盾。可见陈寿在编撰《三国志》时,有意采用行文简净的笔法,这也是《三国志》较少收录私人诗作和歌谣以及多引《诗》以证事、不释诗义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受诗教传统和史书引诗传统以及陈寿“切世大事”的史事著录原则和行文简净笔法的影响,《三国志》引诗较之以前的史书,既有共同点,又有其独特性,这就使得《三国志》在引诗上具有独特的意义。首先,《三国志》引诗以《诗经》为主,所引《诗经》,又以《风》、《雅》为主,引诗为据,继承了《诗经》的“诗教”传统,体现了《诗经》的社会作用。其次,《三国志》“切世大事”的史事著录原则,文质辨洽、行文简净的笔法,为后世史家提供了垂范,具有积极的影响。

注释:

①《晋书》、《宋书》等均载有这类童谣。《晋书》卷二八《五行中》云:“吴孙亮初,童谣曰:‘吁汝恪,何若若,芦苇单衣篋钩络,于何相求常子阁。’‘常子阁’者,反语石子矟也。钩络,钩带也。及诸葛恪死,果以苇席裹身,篋束其要,投之石子矟。后听恪故吏收敛,求之此矟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42页)

参考文献:

- [1]刘勰,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2]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毛诗正义[G]//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4]曾小梦.先秦典籍引《诗》考论[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8.
- [5]礼记正义[G]//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6]论语注疏[G]//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7]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8]范亚栋.“前四史”对诗赋歌谣的采用[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1.
- [9]方韬.《三国志》“轻诗赋重子论”考论[J].中国文化研究,2013,(冬之卷).
- [10]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1]晁公武,张猛.郡斋读书志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12]陈寅恪.寒柳堂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1.
- [13]李慈铭.越缙堂日记·已集:第2册[M].扬州:广陵书社,2004.
- [14]常璩,刘琳.华阳国志校注[M].修订版.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唐 普]